

蔡锷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蔡 锷

刘福祥 赵矢元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4年·哈尔滨

责任编辑：遇秀伟

封面设计：张若一

蔡 鐔

Caie

刘福祥 赵矢元

黑 龙 江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 42 号)

■哈尔滨市龙江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3 2/16 ·字数 60,000

1984 年 1 月第 1 版 198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统一书号：11093·124

定价：0.32 元

目 录

序

一、在新思潮的漩涡中·····	1
二、东渡异乡赤子心·····	7
三、辛亥革命云南举义·····	13
四、廉洁有为的年轻都督·····	21
五、京师虎口走将军·····	32
六、袁氏王朝的掘墓人·····	49
七、身殉共和死而后已·····	74
附：蔡锷生平大事年表·····	87

序

在风景秀丽的岳麓山万寿寺后山，安放着我近代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具有强烈爱国主义精神，为共和制而献身的蔡锷将军的墓碑。

他的一生是短暂的，仅仅三十四年，但那种为中华之崛起而奋斗不息的精神，那种出污泥而不染、廉洁奉公的优秀品德，推翻帝制、使共和思想深入人心的光辉业绩，长存于中华民族的史册。

半个世纪以来，登临岳麓山的中外游人，都满怀仰慕之情，到他的墓前凭吊，寄托着无尽的哀思。

一、在新思潮的漩涡中

一八八二年十二月十八日（光绪八年十一月初九日），蔡锷诞生在湖南省宝庆亲睦乡蒋家冲（今邵东县渡头桥区蒋和桥公社和平大队）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

宝庆位于湖南省中部，略偏西南，形势险要，素为湘西南重镇，古有“铁宝庆”之称。北有首望雪峰二山，东部衡山五岭蜿蜒相连，西南以巫山唐纠山为屏障，是资水和邵水的

汇合处。亲睦乡位于县东，依山傍水，物产丰富，是一个具有中国南方农村特色的风景优美的山村。

他原名良寅，字松坡。蔡氏一族原籍为江西泰和，先聚居邵阳市江北，后分居于邵阳城东樊家冲，又迁到蒋和桥。祖父蔡国珍以缝纫为业，有三个儿子，正阳、正陵、正阶。蔡锷的父亲蔡正陵，为小本布贩行商，还会打铁的手艺，为人性格倔强，以刚正不阿闻名乡里，对于老母却相当孝心，冬天必先到母亲床上将被子暖热，被当时人传为佳话。母亲姓王，贤惠善良，深明事理，是个持家的能手。兄弟三人，松坡居长。

十九世纪末叶，帝国主义列强早已打开清政府闭关自守的大门，清王朝陷入内忧外患的风雨飘摇之中，人民的生活十分痛苦。他的父母，靠着精勤不息的劳动和亲睦乡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居然获得了当时农村的简陋而低廉的生活，不仅门庭整洁，生活愉快，还时常能周济别人。这使蔡锷从小体验到下层人民的疾苦和谋生的不易，对后来生活节俭，从政体恤民情的作风的形成，有相当大的影响。

六岁时，父亲在武冈结识了一位染匠，全家迁居到武冈横板桥（今属洞口县）。这次搬迁给童年的蔡锷印象很深，一路上饱览青山绿水，看到了世界之大，天地之广，开阔了胸襟和目光，陶冶了情怀。到武冈次年进私塾，读诗云子曰，即显现出天资的聪颖。有一次去文具店买纸笔墨砚，老板说，你要能对我一联，便将文房四宝相送，所出联是：小童生三元开泰，松坡立即对上了下联：大老板四季发财。老板拍案叫绝，立刻将文房四宝相送，其才思敏捷传诵一时。不仅如此，他也很用功，每年到了农忙季节，帮家里人干活，晚上

点着灯常常读书到深夜。父亲担心这样会累坏，在劝说无效的情况下，只好用灯油来限制，可他在床下放瓶油，偷着往里添，依旧勤奋攻读。亲友中藏书多的，就是在几十里以外，也一定去借来读，并写了许多札记。到了十岁，已经能写出相当通畅的文章，十三岁初通经史，乡里人称为“神童”。父母为儿子的聪明好学所感动，尽管日子已越来越艰难，他的母亲不得不整天磨豆腐，来帮助丈夫维持生计，还是把松坡送到本邑名士樊锥那里学习。

樊锥，字春渠，出于湖南顽固派王先谦的门下，却是个提倡民权，变法维新的著名“乱党”，著有《开诚篇》、《发锢篇》，为当时许多人视为“怪物”。谭嗣同、唐才常组织南学会时，他曾在邵阳组织分会并任会长。樊讲学白云庵，“对松坡尤为器重，视之如己出，愿亲自教育，期成大器，并担负他的生活费用”^①。他的文章写得痛快淋漓，对蔡锷的文风影响很大。由于尽心培养，教授得法，学业上迅速长进。十四岁湖南督学江标欣赏他的文才，补为县学生，十五岁参加岁试又取列第一。更主要的是樊锥作为湘西南闻名的维新志士，非常重视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常常从中法战争和中日甲午战争，说到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和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激励大家为振兴中华民族去努力奋斗，无疑便成了蔡锷思想上的启蒙者。

由于樊锥的影响，青少年时代的蔡锷就具有了一种非同寻常的叛逆性格。一次和叔叔去汉口，时间是九月初三，在码头碰上鄂省一大群官僚恭候清朝大臣，直到夜里才到，官员们搀扶忙碌，吓得汗水直流。蔡锷看着这些人的奴才相，

竟随口吟出了“可怜九月初三夜，汗似珍珠腿似弓”的诗句^②。

一八九七年，在全国日益高涨的维新浪潮中，湖南巡抚陈宝箴、按察使黄遵宪、提学使徐仁铸，前使江标利用手中的权力，在湖南首倡维新，大胆地任用谭嗣同、唐才常等举办新政。为培养新人，特在长沙小东街（今中山西路）创办时务学堂，以谭嗣同为学监，聘梁启超为总教习。次年三月由督学徐仁铸推荐，蔡锷进了长沙时务学堂。

梁启超作为中国近代第一次思想解放潮流中的英勇斗士和声名卓著的宣传家，吸取了当年康有为办万木草堂的经验，与谭嗣同、唐才常等同心协力，把时务学堂办成了当时最负盛名的学校。

时务学堂既筹办内河轮船、开矿、修铁路等新政，同时教授经史子集和资本主义国家政治法律以及自然科学知识，目的在于培养维新变法、振兴国家的人才。《湖南时务学堂学约》明确指出：“学者若志在科第，则请从学究以游，若志在衣食，则请由市侩之道”^③。梁启超通过教学活动，广泛介绍西学，大力宣传变法思想，公羊学派的世界观，改良主义的政治论，“多言清代故实，历举失政，盛倡革命。其论学术，则自荀卿以下汉唐宋明清学者掎击无完肤”^④。唐才常重点讲《明夷待访录》、《日知录》等书，以明末清初伟大的爱国思想家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的高尚情操启迪后生。按察使黄遵宪也常到宿舍，与同学畅谈国家大事，勉励青年担负起拯救中国之责。教学上采用按日作札记，由教习批改的方式，学生有难点或新的想法，还可以随时求教，或者大家讨论，各抒己见。南学会当时在孝廉堂常请名流学者讲学，时务学

堂都组织学生参加，自然开阔了眼界。这种倾向于民主政治的教学内容和不拘一格的教学方法，使学生皆自期许，有慨然以天下为己任之志，学堂很快成为维新派活动中心之一，也培养了许多人才。我国近代教育家范源濂、军事家蒋百里等均毕业于时务。

蔡锷在这里，从过去的八股文到作策论；从经史子集到英文算学，完全进入了新的天地。时务学堂的学生中他年龄最小，初看上去体质文弱，但聪明活泼，有一种不同于其他同学的诚恳谦虚、认真坦率的态度，而且言论见解颇有独到处，每月月考皆居前列，极受梁启超的赏识。师生相差十来岁很合得来，经常共同讨论各种经济及社会问题。梁启超后来回忆说：“我们在一块儿做学问不过半年，却是人格上早已溶成一片”^⑤。黄遵宪对蔡锷也特别喜爱，一八九九年特意作了一首怀李炳寰、蔡艮寅、唐才质的诗，抒发自己的寄希望于后辈之情：

谬种千年兔园册，
此中没埋几蒿莱。
国方年少吾将老，
青眼高歌望尔曹。^⑥

当蔡锷在这所充满了新时代气息的学校里刻苦学习的时候，家里生活已难以维持。他非常理解父母的心情，悄悄地退了学，到父亲的铁匠铺里学打铁。梁启超知道了事情的经过，特意把他父亲请来，说松坡有奇才，应当继续读书，并答应能免费的免费，其余自己负责，这样又回到了时务学堂继续学习。

在梁启超的影响下，蔡锷把主要精力，放在研究中西方社会问题上，同时很喜欢阅读兵书，了解西方战争新知识。课余之暇必与同学言学论政，谈及当时社会之腐败，悲愤之情溢于言表，决心贡献一切，以挽救国难。同学中不少人侈谈时务，耻笑他学非所用，蔡锷毅然表示“将学万人敌”。

同年梁启超、谭嗣同应光绪帝之召赴京，与康有为积极筹备并于六月开始变法。但刚过百日慈禧太后就发动了政变，谭嗣同等六君子慷慨就义，康有为、梁启超逃往日本，随之陈宝箴、黄遵宪等被革职，时务学堂在顽固派的攻击下也被解散。

戊戌政变前，陈宝箴曾主持考送湖南出国留学生，五千人中蔡锷列第二名，随变法失败，留学化为泡影。他几乎痛不欲生，暗中联络同学，谋刺慈禧太后，没有成功。到武昌想入两湖书院，因为是时务旧生，有新党嫌疑，又被拒之于门外。后来辗转到上海，在原时务学堂英文总教习李维格先生的帮助下，才考进南洋公学。然而那里枯燥陈旧的课程，又使他不满意，年底便回到了家乡。

目睹万马齐喑的祖国，蔡锷不知自己人生的路该怎么走，心情十分忧郁。恰好梁启超从日本来了信，让他设法去日本。因为横滨华侨富商已答应资助留学。蔡锷满怀对老师的感激之情，仅带二百铜钱，从长沙勉强到了上海。正苦于无资东渡，听说一位湖南同乡要去日本经商，便到寓所拜见，请求帮助。商人一方面敬佩梁启超的鼎鼎大名，也为他年纪轻轻的志向所感动，欣然答应，于是蔡锷踏上了新的生活旅途。

① 唐希朴：《回忆蔡松坡先生创办广西陆军小学》，《湖南文史资料》第4辑第218页。

② 天杆生、冬山合编：《黄克强蔡松坡轶事》，第77页。

③ 《湖南时务学堂学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第62页。

④ 《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四，第62页。

⑤ 梁启超：《护国之役回顾谈》，《史地学报》第2卷第3期，第71页。

⑥ 唐才质：《追忆蔡松坡先生》，《湖南文史资料》第1辑，第106页。

二、东渡异乡赤子心

一八九九年夏，蔡锷到了日本。在梁启超、唐才常帮助下，先入东京大同高等学校，补习日语和普通学科，同时研究政治哲学，后来又改入华商东亚商业学校学习。

东京的中国留学生，大多出身高官显贵之家，在异国也极尽奢华。蔡锷却两手空空，生活相当清苦。梁启超出逃时，虽然岳父李端棻有所资助，携家带眷，也并不宽裕。但还是尽自己所能，在东京小石川久区坚町租赁三间房屋，给十几位同学居住。蔡锷只能一边读书，一边靠投稿《清议报》和后来译书所得稿酬自给。

戊戌变法以后，随着清政府白色恐怖的加剧和国内政治舞台上许多风云人物的亡命东渡，中国革命和维新的中心转移到日本。孙中山所领导的兴中会与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保皇党，此刻还没有正式分野，关系处于相当微妙的阶段。

早在孙中山获悉慈禧太后发动政变的消息时，就分别请日本友人宫崎寅藏和平山周等，到中国帮助康有为梁启超出

逃。到了日本都是流亡人，难免有同病相怜之感。孙中山先生想亲自到康有为住所表示慰问，并争取共同革命，但康有为狂妄自大，竟借故不见，而且后来日益失去公车上书时的勃勃朝气，变得越来越顽固保守。但梁启超到日本读了许多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的著作，表现积极开明，曾和孙中山、陈少白讨论合作问题，特别是当康有为被日本政府驱逐赴南洋后，梁与孙中山先生来往频繁，关系密切，甚至已经表示赞同革命派的主张。

梁启超戊戌变法后，是执中国舆论界牛耳的人物。在自己主办的《清议报》上，以一脱古文的深奥艰涩，用半文半白，半雅半俗的饱含爱国主义情感的笔调，阐述着孟德斯鸠、卢梭的资产阶级理论和“名为保皇，实则革命”的开明的、渐进的乌托邦式主张，在中国知识分子中引起强烈反响。学生时代的蔡锷，既崇拜谭嗣同视死如归的精神，也崇拜梁启超渊博的学识。到东京后师生住在一起，关系密切，很自然地改良主义思想便在他的头脑中占了统治地位，并直接影响到一生的政治进程。

他曾先和吴禄贞等创立励志会，随后又加入唐才常组织的自立会。这些团体虽然都以求中国的独立富强为目标，所取途径却未摆脱君主立宪。

一九〇〇年夏，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义和团运动。已经丧失了和平改良希望的保皇派认为时机已到，决定进行一次突发性的“武装勤王”。为此动员了全部力量，康有为在新加坡指挥全局，梁启超赴檀香山筹款并与各方联络，国内重点唐才常组织于沪汉，何炳光等活动于两粤。由于发难正处于帝

国主义侵略中国之时，革命派给予了支持。随唐才常回国的东京留学生二十多人，大都兴中会员，“醉心革命真理，”对中山先生尤其“倾倒备至”。梁启超珍惜人材，仍把蔡锷和范源濂留下继续学习，没有让他们回国。出发前在日本红叶馆设宴相送，孙中山、陈少白和日本朋友平山、宫崎都在座。中山先生并写信给汉口商行兴中会会员容星桥，请其予以协助。

同学出发后，蔡锷报国之心愈发急切而不可按捺，毅然只身回国，从上海到汉口找到了唐才常。唐因其年龄太小，不忍以艰巨之任相托，但他坚决不肯，只好派他到湖南，约新军教练黄泽生起义。

唐才常在上海先以保种、保国为号召发起正气会，后改名自立会，邀请在沪名流于七月二十六日到张园举行国会，容闳被推为正会长，严复被推为副会长，唐才常被推为总干事。但唐所起草章程即自相矛盾，既要革命又要保光绪帝，结果章太炎当众剪下辫子，以示与清政府战斗到底之决心，然而唐仍是幻想同英帝国主义拉上关系，建立一个以两湖为基地的“自立国”，并定于大通、汉口同时举义。举事的准备阶段，即暴露了保皇党组织的涣散和领导指挥上的无能，特别是在大通八月九日举事失败后，康有为无耻地将六十余万元华侨所捐购买军火款贪污，对唐才常不予接济，而英帝国主义者后来感到有碍于他们独霸中国南部各省阴谋的实现，决定中辍“自立国”，汉口总机关二十一日被英领事馆协助张之洞破获，唐才常等二十多人殉难。蔡锷持唐函到达湖南，黄泽生即认为是冒险举动，可能徒自牺牲，便不准他离开，

而幸免于难。

汉口举事失败，使蔡锷痛感掌握枪杆子的重要。化装潜回横滨，便决心投笔从戎，并为此而更名锷。对此梁启超都深表怀疑，说：“汝以文弱之书生，似难担当军事重任”^①。他当场立下军令状，不成为一个合格的军人，便不算其门生。在梁启超帮助下，先入陆军成城学校，毕业后以候补生改投日本仙台第二联队为入伍生，准备报考陆军士官学校。这里生活艰苦，操练严格，日本人对中国留学生刻薄歧视，蔡锷因为穷，还常受富人（华人）子弟的嘲笑。他怀着为民族复兴，国家强盛学习军事本领的远大抱负，以惊人的毅力，提高军事素质。为锻炼体魄和意志，天天作海水浴；常对同学说：“凡作海水浴者，原为锻炼身体，非仅为水上游乐也。须以烈日晒之，海水浸之，时晒时浸，日久不怠，久之，皮肤日黑，便成钢筋铁骨矣。”^②在成城学校，屡次考试都名列前茅，而毕业成绩尤佳，旋与蒋方震以自费考入士官学校，二人同为我国近代军界著名的“留东四杰”之一。

在这期间，他还以奋翮生的笔名作《军国民篇》，登于《新民丛报》：

中国之病，昔在神经昏迷，罔知痛痒，今日之病，在国力孱弱，生气销沉。扶之不能止其颠，肩之不能止其坠，奋翮生曰：‘居今日而不以军国民主义普及四万万，则中国其真亡也。’^③

他认为日本近代兴盛的原因，是在于有军国民主义的国魂，而中国之所以没有形成，原因在于教育上中国“授以仁义礼智，三纲五常之高义，强以龟行鼯步之礼节或读以靡靡

无谓之辞章，不数年遂使英颖之青年化为八十老翁，形同槁木，心如死灰，受病最深者，愈为世所推崇。”^④其次他认为文学作品多写战争的凄惨，而极少塑造沙场英雄，在人们心理上造成了极坏的影响；最后他猛烈抨击了孔教，指出应当注重健全国民体魄，改善武器装备，同时应当彻底改变“好铁不打钉，好人不当兵”的传统陋习！

“兵者，国家之干城，国民之牺牲，天下之可尊可敬，可馨香而祝者，莫兵若也。捐死生，绝利欲，弃人生之所乐，而就人生之所苦，断一人之私而济一国之公，仁有孰大于兹者。”^⑤

显而易见，文章中不乏改良主义的幻想，对军队的阶级属性认识也很模糊，但对中国专制内幕的分析，对提倡民权，唤起国民精神的重要性的认识，军队、民众、国家三者关系的分析，都比较深刻和透彻，显现出蔡锷在军事方面的天才。日本河边半五郎赞扬备至，亲自翻译成日文，介绍给日本军界，连同蒋方震所著《军国民教育》汇成军事编，到明治末年已再版七次。

八国联军进北京，辛丑条约签订，使蔡锷忧心如焚。不久又接到父亲逝世的消息，他曾短期回家料理丧事。返回日本后，念祖国之危亡，想起汉口举义战友的惨痛牺牲，父亲辛辛苦苦早逝的可悲境遇，心情极为惆怅，身体健康状况一度很不好，就在这痛苦的思索中，推翻清政府的思想开始萌芽，随后又振作精神，投入到新的生活和战斗中。

他和王亮畴等创办《国民报》，鼓吹民族主义，推翻清政府。认为革命重在实行。又和留日同学范源源等组织湖南编译社，歃血为盟，以死为期，誓覆“满洲”。一九〇三年四

月，沙俄在庚子之役占领中国东北原规定的第二期撤兵期限已到，但拒不履行条约，留日学生掀起声势浩大的拒俄运动，蔡锷曾参加抗俄义勇队，这个组织是后来华兴会的前身。

但是由于头脑中打下的深深的改良主义烙印，与梁启超师生之间感情的影响，使他思想上和唐才常有相同的改良与革命交织的状态。当一九〇一年八月章太炎在《国民报》发表《正仇满论》之后，革命派与保皇派展开了论战，已出现水火不容之势。许多留学生加入了孙中山先生所代表的革命行列。蔡锷虽然也曾参加一些活动，却始终没有在组织上体现出来。

汉口举事次年，他曾草《致湖南士绅书》，阐述了日本明治维新得以成功的原因及重大的历史作用，希望湖南带头维新，为全国表率。同时指出：“人老难于图新，国老难于图变，而地小则事易举，势大则功难为，此天下之至情也。埃及、印度、犹太、突厥、希腊、罗马之数非灭即弱，此皆天下之旧国，政教学术创之于己，自足过甚，自信太深，而久乃浸寻衰败也”^①。这种对中国古老社会的分析，与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确有许多不谋而合的可贵之处，但也是思想上摇摆不定的突出表现。而且持续到他将要回国之际，写给湖南巡抚赵尔巽洋洋五万言的劝行新政信上，把中国复兴自立的希望，寄托于顽固的封建官僚，显然是天真的幻想。

① 唐才质：《追忆蔡松坡先生》，《湖南文史资料》第1辑第107页。

② 同上。

③ 《蔡松坡先生遗集》2卷，《军国民篇》第1页。

④ 同上，第4页。

⑤ 同上，第6页。

⑥ 《蔡松坡先生遗集》，12卷，第14页。

三、辛亥革命云南举义

一九〇四年七月，蔡锷回到了祖国。

他先应江西巡抚夏时之聘，为续备左军随营学堂监督，材官学堂总教习及监督；次年正月应湖南巡抚端方之聘，任教练处帮办，武备、兵目两学堂教官，因愤恨清廷腐败，救国心切，革命情绪高涨，不久即被辞退。是夏广西巡抚李经羲奉调赴桂，特相聘并派员来迎，于是他带着学生雷飙等十余人到了广西。

在广西五年多的时间，蔡锷先后任教练处帮办，武备、兵目两学堂教官，参谋官兼总教练官，随营学堂总理官，测绘学堂堂长等职。次年夏到彰德参观秋操演习，被派为中央评判官，以后又任新练常备军第一标标统，龙州讲武堂监督，新军混成协协统，学兵营长等职。同时鉴于中法战争耻辱，曾微服去越南（当时法属殖民地），侦察法军各要塞的兵力部署，绘成越南要塞图，这和后来的桂边要塞图，是我国近代重要的边防地图之一。

虽然任职较多，调动频繁，但他治军有方，颇负盛誉。刚接办龙州讲武堂，不少学生聚众闹事，甚至赌博杀人。他撤换官长二十多名，只留一名排长，遣散兵丁二百多，重新招收学员，先问当兵责任如何。下级中官，他主要从淳朴耐劳的青年中选拔，极少任用市井浮华子弟。一九〇六年冬，任广西陆军小学总办。所选择的教员，富有理想，品学兼优，